

港澳檔案中的 辛亥革命

霍啓昌 著

商務印書館

港澳檔案中的 辛亥革命

霍啓昌 著

商務印書館

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

作 者：霍啟昌

責任編輯：徐昕宇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589 7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序

本人並不是研究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的專家，只是專業研究香港及澳門歷史，而能夠專業從事研究港澳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關係，是獲中央要員及史學界前輩的任命及啟導的緣故。

這可追溯到 1983 年，中國史學會於文革後第一次召開全國史學會議，本人應邀到北京參加，期間獲籌辦會議的主腦人物胡繩老前輩，特別在舉行會議的京西賓館房間接見會面。當時，胡老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及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會長。當天的情況及他所說的一番話仍然歷歷在目及餘音猶在。胡先生談到研究孫先生的早期革命思想，直接的第一手資料十分缺乏，而我是少數專門研究港澳歷史的史學家，他要求本人在搜查港澳檔案史料時，特別留意是否仍存有有關孫先生在港澳策進辛亥革命運動的珍貴資料。所謂恭敬不如從命，本人欣然接受這個使命，而亦可算是不負使命，果然在港澳檔案發現十分珍貴的有關乙未首義及其他有關孫先生的資料。本人不單將其翻譯成為中文並且寫成文章，先後在中央一級文獻發表，例如〈幾種有關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策劃革命的史料試析〉，《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中華書局，北京，1986 年，440－455 頁；〈香港，香港華人與近代中國〉，《近代中國與世界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990 年，722－732 頁；〈孫中山先生早期在香港思想成長的初探〉，《孫中山的時代》，中華書局，北京，第三冊，1990 年，929－940 頁；〈香港在辛亥革命成功中的作用的研究〉，《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中華書局，北京，1994 年，487－502 頁；〈認識港澳史與辛亥革命研究一些新方向芻議〉，

《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7月，頁2320－2368等便是。

今年三、四月間，在一個偶然機會下，我得與闊別一段時間的好友陳萬雄老總相聚，他談到今年是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周年的大日子，並建議我將這些文章編成論文集出版。但本人一向對出版論文集不感興趣，因為文章已供人閱讀，並無新意。而陳總熟悉國內出版情況，他提點我，中央一級文獻刊物印刷數量很有限，並非一般學者所能閱讀得到。這一點是我以前未有想及的，所以我開始有些猶豫。他再次鼓勵我將這些文章重組，並補入近年來本人發表的一些新論點及新發現的相關資料，編成一新書出版。這可抽着本人最大的弱點，就是整生死性不改的習慣，喜歡接受難度極高的挑戰，尤其是一般人認為無法在很短時間完成的任務，只要是我認為值得做的事。當然最後打動我的心，還是能夠藉此向在整個辛亥革命運動中出錢出力，甚至捐軀的香港愛國華人英魂，致最崇高的敬意。

由此，本已高齡的我便開始了在三、四個月內自找苦吃、人間地獄般的趕稿生涯。幸得萬雄兄的經常鼓勵及支持，毛永波、徐昕宇先生的苦心催迫及多次細心審閱稿件，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最後完成本書。藉此機會向他們表示衷心謝意。又在文稿輸入及蒐集資料中得到禰鳳鳴小姐及黃遠娜小姐的幫助，亦謹致同樣謝意。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太太。本來今年一早承諾在五、六月期間，回美國與兒孫及親友歡聚，慶祝我倆結婚四十周年紀念；但得到她的無私諒解，將此事擱置，並在艱苦趕工的幾個月當中，耐心陪伴左右，悉心照顧，才能編成此書。亦謹向這位在漫長人生旅程中，犧牲一切、追隨左右的忠誠老伴及戰友，致以衷心敬意。

目 錄

序	i
1 香港澳門在孫中山研究中的重要意義	1
2 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澳策進革命的重要地方史料闡釋	9
I) 香港史料	9
II) 澳門史料	26
3 香港(澳門)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39
4 為甚麼香港、香港人能夠對辛亥革命運動的成功 作出重大貢獻	74
I) 港澳的有利環境	74
II) 現代化的城市建設與革命思想的啟發	76
III) 港澳經政環境造就富有及有政治地位華人	81
IV) 香港教育社會環境與支持策進革命運動的華人精英	89
V) 武昌起義成功與香港華人的反響	99
VI) 結論	102

1 香港澳門在孫中山研究中的 重要意義

澳門、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均曾扮演過相當重要角色，但礙於種種原因，一直並未受兩岸史家重視，只是大約從 1980 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與英國政府進行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大陸的歷史學家才首次公開表示需要更多地了解香港歷史。隨着香港、澳門回歸的日期迫近，他們對編寫“港澳史”的興趣與日俱增。同時由於港澳回歸一事，受到世界傳媒廣泛關注，一些外國史學家亦同樣因為政治因素，開始認真從事香港、澳門史的研究，所以近幾年來，港澳史的研究可以說是較豐碩的成果。¹

香港、澳門與辛亥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兩地與中國近代史密切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由於香港史及中國近代史的專家都是近年來方加以重視，所以亦是在近年來才開始有一定的成果。²但若果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個重要課題，則必須具備一些專業技能，如必須懂英文、葡文；熟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港澳社會、政治

1 請參看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1年；K.C. Fok, "Hong Kong Historical Research in Hong Kong, 1895-Present." In *Asian Research Trends*, No. 3,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oyo Bunko), 1993, pp. 1-19；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室編，《中葡關係四百五十年圖書目錄》，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9；吳志良：〈澳門史研究述評〉，《行政雜誌》第32期509-520頁，1996年。

2 請參看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152-181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霍啟昌：〈香港在辛亥革命成功中的作用的研究〉，《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487-502頁，中華書局，北京，1994年；霍啟昌：〈淺釋港澳檔案所藏有關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研究的一些資料〉，《學術研究》，廣州，1997年，第二期，60-65頁。霍啟昌：〈認識港澳史與辛亥革命研究一些新方向芻議〉，《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7月，2320-2368頁。

和經濟的情況，才能認真了解港澳對辛亥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要了解早期革命思想的產生和早期革命運動開展的詳情，自然要深入研究孫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和他最先策劃革命活動的過程。1989年，在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舉辦的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有好幾個專家的報告都同意研究孫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動，存在一定的困難，就是直接資料缺乏，主觀因素知道的不多。³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少年的孫中山先生在中國的生活範圍，只在香港、廣州、澳門一帶，而且他曾經前後在香港就讀六七年之久，這段經歷極有可能影響到他的革命思想的成長，所以要研究孫先生早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動，必須利用香港原始史料，去作進一步的了解。假若能夠深入去調查這些香港史料，不難找到很多非常重要的間接資料。多明了一些客觀的環境，可以幫助我們充實推理的方法，加強論證的說服力。例如，想進一步了解孫先生在港就讀這段時間的思想和活動，首先要認識當時香港社會的背景和政治氣氛，和他在港所能接觸到而可能影響到他的人物，以至在香港當年所發生過的大事等等。掌握到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實況，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去明了一些發生在孫中山先生身上的事實，是在怎樣情況下發生的，這樣可以避免籠統和抽象式，或斷章取義式的推論。這才是實事求是研究孫先生早期思想的一個較完善的方法。

孫中山先生就讀於香港拔萃書院和大書院是在1883至1885年期間，而肄業於西醫院則在1887至1892年這五年期間，這是少年孫中山思想成長最重要的時刻。

當時，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正經歷重大的變化，華人開始爭取到較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影響力。首先，伍才（即伍廷芳）在

3 這些報告其後北京中華書局編輯成書，見《孫中山的時代》，中華書局，北京，第三冊，1990年，請參看其中一篇，霍啟昌：〈孫中山先生早期在香港思想成長的初探〉，《孫中山的時代》，中華書局，北京，第三冊，1990年，929-940頁。

1880 年被港督暫時委任為定例局（後稱立法局）議員；隨即在 1883 年年底，黃勝被正式委任為首任華人議員。因為政府已通過修改法例，規定定例局要有一名華人代表為議員，故此在黃勝退休後，由曾經教過孫先生的何啟醫生繼任。在經濟方面，從 1870 年代後期開始，華人已開始嘗試收購洋商因營業不振而關閉的商行。在 1880 年代初期，香港華商的財富已有追越洋商的趨勢。例如，在 1880 年 1 月至 1881 年 5 月這段時間，華人購入原屬洋商所擁有的地產和物業，共值 171 萬元。⁴ 同期，港督軒尼詩在定例局提出報告，談及華人是港島的最大業主，港府的稅收，有百分之九十來自華人。而每季繳納地稅一千元的香港業主共有十八人，其中只有一家為洋商，其餘都為華人。⁵

華人在當時香港經濟影響力的增強，亦可以在下面的事件上看到。1881 年 4 月 23 日，以保良局主席馮明珊為首的一批華民紳商，進謁港督獻頌詞，讚揚軒尼詩在任四年以來“宏敷德政，諸凡順遂，即港中之富厚，日盛月增。”⁶ 軒尼詩在答謝詞中亦坦承認定，香港這段時期對外貿易獲得重大發展，因而帶來財富以開拓港島的經濟活動，是有賴華人在港強大的組織。據《轅門報》的記載：“燕制軍（即軒尼詩）遜謝首事諸人頌揚之美意，云所言闡港‘諸凡順遂’一語，本部堂以為不盡由本部堂有所作為，良由諸公中所有商賈銀號店戶諸人所致居多也。”⁷

香港華人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不在孫先生腦海中留下一定的印象。相信沒有人懷疑孫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的話：“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1885）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孫先生又在《建國方略》談到“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

4 Endacott, G. B. 1973,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6.

5 同前註，第 195 頁。

6 香港《轅門報》：1881 年 4 月 23 日第 274 頁。

7 同前註，第 276 頁。

學課略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而孫先生更在其他地方再重複上述的說話，例如於1923年2月20日在香港大學的演講詞中便談到他的“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

孫先生尤其欣賞香港當時良好的“衛生與風俗”。這可以從1923年2月20日孫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講詞中清楚地見到：“回憶卅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得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⁸孫先生在文中所謂“衛生”，即是指當時香港政府釐定施行的“齊整及潔淨”制度。而所謂“風俗”，孫先生在同演講詞下文有所引申解釋，其實主要是指治安良好和政府官員腐敗事尚少：“覺得在鄉間與本港，確大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得如許妥當？……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⁹

孫先生這篇在港大發表的演講詞，一直都被學者懷疑其內容的真實性。一來由於孫先生身在香港，對港人及港府恭維一番，大概是任何演講者慣常的客氣話。更且，事隔已卅年，講者記憶是否猶新，尚屬疑問。但這畢竟是有關孫先生早期思想難得的直接線索，由於孫先生在原文更談到他的“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因此，孫先生少年時代的革命思

8 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1日。

9 同前註。

想，是否真的受當時香港社會制度啟發而產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可惜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未被專事研究孫先生的學者所重視。本書在其後章節將會深入探討分析。¹⁰

本書的以下一章亦會利用充實的史料說明香港和辛亥革命運動有着深厚的關係，以及證明以下的說法是正確的。¹¹ 中國革命自創立興中會，以至辛亥革命成功的期間，每次起義都是利用香港作為基地、重要策劃中心或聯絡站，各次革命起義的經費，相當部分都是向香港愛國華人募捐得來的。每次起義失敗後，曾參與行動的革命黨人，大都逃到香港，作為避難場所。革命運動除了在起義時需要大筆經費援助，就是平時，革命黨員都要一筆為數不少的經費去應付固定的支出，例如在港九各處設立機關總部、招待所，辦報刊宣傳革命工作，都是有賴不少愛國港人在經濟上大力支援，才能令革命運動得以度過早期一段艱苦的日子而延續下去。香港在替革命黨推廣及宣揚革命宗旨和革命言論上，曾立下汗馬功勞。辛亥革命最後能夠成功，實是有賴以致的。基於上述香港和辛亥革命運動的深厚關係，我們可以斷言，沒有香港和香港華人的支持，中國近代史上革命的進程可能會採取不同形式和方向。

至於澳門，在上述的〈有志竟成〉中，孫先生早就提及“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1892～1893）、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而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倫敦避難記”序言又曾說過這樣的話：“時在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於珠江江口之澳門……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實始於是地。”

除此之外，孫中山先生與澳門的關係亦十分密切，只可惜過往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家多未留意。首先，澳門是孫中山走向世界、踏足社會

10 見本書第四章。

11 見本書第三章。

的通道。孫在十二歲時經澳門乘船抵達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後來，在香港求學時候，澳門便成為他往返省港的必經之地。孫畢業於香港西醫院後，也是先在澳門行醫。孫棄醫從政，澳門又成為其革命活動其中一個舞台。首次起義失敗後，孫亦是得澳門友人救援，經由澳門脫險逃亡國外的。武昌起義成功後，在締造和捍衛共和國的鬥爭過程中，孫往往把廣東和西南地區作為革命活動的主要基地，澳門和香港也因為特殊政治地位而成為重要據點，尤其是在維繫海外華人對孫中山的支持和籌集革命軍政府的軍政費用等方面。為此，無論在孫中山早期反清的鬥爭中，還是後期反對袁世凱、北洋軍閥乃至對桂系軍閥的討伐中，澳門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¹²

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澳門為不少孫中山摯親長期居留的地方。例如孫的兄長孫眉，元配夫人盧太夫人，以及他的兩位女兒及孫女等，便是一例。為此，雖然孫親身來到澳門的次數不多，但也常常寫信到澳門，以便一直能與摯親保持聯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孫中山的摯親甚至是死於澳門，或是葬在澳門的。說澳門是孫中山家族的第二故鄉，亦不為過。¹³澳門在孫中山整个人生里程裏，曾有如此重要的密切關係，所以研究孫中山的專家，亦應多些了解澳門對孫中山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對中國近代偉大的革命家的研究，澳門是絕不能忽略的對象。

年輕一代的港澳華人，當了解到港澳地區及港澳華人對辛亥革命成功有重大貢獻，自然會進一步去了解香港、澳門與中國內地在歷史、文化、經濟以及政治方面的聯繫。若有這些基本的認識，可以提高個人的國民及民族意識。港澳華人必會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會更尊重中國文化及傳統，及明白到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歷史上一直對中國發展有所貢獻，

12 張磊，盛永華，霍啟昌編《澳門：孫中山外向門戶和社會舞台》，澳門大學出版，1996年第25頁。

13 同前註。

自然會樂於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作出努力。同時，亦會更深切了解中國於過往在維持港澳地區的安定繁榮的重要性，從而關注中國最新的發展情況，並嘗試去了解港澳地區對當今中國的現代化所能作出的新貢獻。

通過對港澳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正確認識，自不然明白到孫中山先生策進革命的最終目的：“革命目的所在，欲使中國為世界最強之國，最富之國，又政治最良之國，此種目的當合全國人民為之，乃可達到。”這一番話的確是偉大的愛國者的聲音，是在屈辱與痛苦中生活的中國人民的意願的反映。這個大目標基本上成為以後有識之士的一致的大目標，大概是毋須懷疑，只是在用甚麼方法去達成這個目標，各人尚有意見分歧。

抗日戰爭勝利，中國是將國土保住了，偉大的中華民族亦是保住了。回顧孫中山先生的一生，他確實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主革命先行者，他能與時俱進，決不在奔騰的“世界潮流”前故步自封。為了祖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他獻出了自己的一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前面所提及的，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偉大愛國、創國人士所訂下的富強中國、建設中國、為中華民族謀幸福的一致大目標，則尚未完成。

既想有英國和美國高度發達的工業，但又想避免西方國家人民所經歷的慘痛生活，成為孫中山先生一生冀求解決而實際未能解決的矛盾。若果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一段歷史，可以反映出中國領導人仍然着意努力尋求方法去完成這個意願。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數十年的不斷努力發展，中國的國力已發生了根本上的轉變，中國人民已擺脫了外國侵略者的威脅，已成為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今後，只要繼續發揮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懷，共同朝着富強中國、建設中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目標進發，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但要達到孫中山先生至終的目標，必然是要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

業。為此中國領導人已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這是國際上認同和接受的中國和平統一的方法，亦是大多數海外中華兒女寄望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政策。現時台灣人民生活得很好，自由和權利越來越多，他們為甚麼要改變現狀？因此，必須證明給他們看“一國兩制”在台灣施行是對他們有好處。

“一國兩制”實施於港澳，其主要精神是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港澳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及法律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港澳居民原來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等適用於港澳的有關規定，將繼續得到法律的保障。除了國防與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管轄外，其餘行政、立法、司法事務，均由特區自行管理。

上述問題，回歸中國超過十年的香港大概可以說是處理得相當成功的，澳門亦可稱是初步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只要港澳人士同心同德，努力克服一切難題，持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給台灣作一個良好示範，則不難加強“兩岸四地”人民的文化、經濟的聯繫，以至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共識。沒有這種民族的共識，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同舟共濟等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致。

今年，為了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週年；為了緬懷孫中山先生；為了完成他的至大目標，身為港澳人士，能夠正確認識孫中山、辛亥革命與港澳的緊密關係便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因為既然孫中山、辛亥革命與港澳及港澳華人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港澳華人就必須秉承其遺志，在促成祖國統一的大業中盡一分綿力。

2 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澳策進革命的重要地方史料闡釋

I) 香港史料

澳門、香港檔案是否藏有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珍貴資料，在 1980 年代前一直未有學者認真深入探討，相比較而言，學者對香港檔案稍為有一些論述。¹⁴ 這方面的著述稀少，主要原因在於學者必須懂英、葡文。所謂檔案資料，通常是指未公佈的歷史文件，應是未經整理刊印的，是研究港澳史最重要的原始資料。這些香港檔案資料包括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132、133、882；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 17、228、233、371、677，以及英國議會文書和港督私人檔案等。而這些都是英文檔案。其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則以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 及 882 最為重要。¹⁵

雖然孫中山先生在早期策進革命運動時與香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直至到 1980 年代，在大陸和台灣出版的各種重要革命文獻中，都沒有收錄在香港出版或藏在香港檔案內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策進革命活動的

14 霍啟昌：〈研究香港史各種資料評選〉，《香港史教學參考資料》41-58 頁，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 年；K. C. Fok,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H. K.) Ltd., 1990, pp. 36-52；霍啟昌：〈幾種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策進革命史料試析〉，《回顧與前瞻——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440-455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15 同前註。

英文第一手史料。¹⁶ 這些第一手史料，除上述的香港檔案資料外，還包括辛亥革命期間在港出版的四種英文日報。¹⁷

有些學者在研究涉及辛亥革命的各種問題時，曾經局部或零碎地引用過這些史料。例如史扶鄰教授有關孫中山先生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的巨著，¹⁸ 陳曼如女士多年前在香港大學歷史系撰寫的有關香港革命黨員之研究的碩士論文，¹⁹ 即已留意到其中一部分資料。前些時，已故林敏森君在本書作者指導下更具體和有系統地利用辛亥革命期間這四種香港英文報紙所報導的，有關革命黨員在港活動過程的資料，來編寫他的碩士論文其中的一章。²⁰ 本書作者是第一位以專文介紹這些英文資料並嘗試分析這些資料對研究辛亥革命的價值的學者。²¹

研究香港歷史的原始資料，最重要的是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 的原稿本書信公文。²² 這個檔案收錄的公函包括以下幾種：（一）1841 年至 1946 年間，歷任港督與英國殖民地大臣的一切往來書信和附帶文件。（二）同時期英國殖民地部有關管治香港的會議記錄和備忘錄公文。（三）同期中殖民地部與其他英國政府部門；或任何私人機構；或任何人士商討有關香港事宜的往來文件。香港檔案館多年前已開始從事編撰這個檔

16 例如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1973 年；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1957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1982 年。

17 下文將有詳細解釋。

18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8，即史扶鄰：《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

19 Chan, Mary Man-yue: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Hong Kong, 1895-1911*,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3，即陳曼如：〈有關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香港革命黨之研究〉。

20 Lam Man-sum, *Hong Kong and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four Hong Kong English Newspapers 1895-1911*, M.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即林敏森：〈四種香港英文報紙報導有關香港和中國改良與革命運動之關係的研究〉。

21 參看霍啟昌：〈幾種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策進革命史料試析〉，《回顧與前瞻——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440-455 頁，中華書局，1986 年。

22 CO 129,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即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原稿本往來函件。

案的目錄，至目前為止，這個檔案目錄只編到 1920 年。²³ 香港檔案館藏有此檔案全部公文的縮微膠卷，但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則只藏至 1940 年。²⁴

英國外交部檔案中，收錄了不少辛亥革命期間有關中國事宜的文件。例如外交部檔案編號 17、228、233 和 371 便是。²⁵ 這些檔案中又以編號 17 對研究辛亥革命早期的過程較值得留意。這個檔案包括以下幾種：（一）由 1815 至 1905 年間，英國駐外國領使及外交官員致英外交大臣的原稿本彙報和往來公文；（二）同時期駐英國的外國使節跟英外交部的往來書信；（三）同時期英外交部與其他人士的往來書函。這些外交部檔案都是以國家來分類的，所以有關香港的檔案可以在中國部分找到。不過，外交部檔案收錄的有關香港事宜的公文，通常都另已附錄在殖民地部檔案內，但偶然亦會有些公文只能在外交部檔案內才找得到。所以，研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策進革命運動這個題目，雖然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 是最重要，但外交部檔案編號 17 和其他以上提及的編號，都值得我們去調查。這幾種英國外交部檔案，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都藏有縮微膠卷，更且，該圖書館從這些外交檔案，抽取有關香港的條目，編成香港條目纂編，只供館內讀者索閱，要是想知道以上所提及的幾種英外交部檔案，是否有涉及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策進革命的文件，可從這個條目纂編得知大概。

辛亥革命前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日報，現尚存的共有四種。其中最早開辦的大概要算《德臣西報》(CHINA MAIL)。據查考，該報是 1845 年

23 CO 129: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ntents, 1841-1920, V1-V10，即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 129，《有關香港原稿本往來函件目錄》，第 1-10 冊。

24 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是香港大學內專收藏有關研究香港資料的藏書單位。欲知該圖書館藏書情況，可參看 Yeung Kwok-hung: *Hung On-to Memorial Library*，即楊國雄：〈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簡介〉一文。

25 F. O. 17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 F. O. 228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 F. O. 233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Miscellaneous) ; F. O. 37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